

日中関係史

(1972~2012)

〔日〕园田茂人 主编

步平 审校

马静 周颖昕 等 译

日中关系40年史

(1972~2012)

Ⅲ 社会·文化 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日中關係史

(1972~2012)

〔日〕园田茂人 主编

步平 审校

马静 周颖昕 等 译

日中关系40年史

(1972~2012)

Ⅲ 社会·文化 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出版前言

200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学者编撰的《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一书，以中国学者的视野全面审视了自《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1978年至2008年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在中日学界引起较大反响。因应此书的出版，当时日本中日关系研究界的学者即提出也要编撰一部同样主题的研究专书，以反映日本学者的观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日中関係史1972~2012』三卷本，2014年又增加了民间交流卷，共为四卷）。

由日本学者高原明生、园田茂人、服部健治、丸川知雄等领衔编撰的《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间交流四卷，以日本学者的视野全面、深入地论述了自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至2012年间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脉络，既有一般情况的叙述，也有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并进而在所论列的问题上阐明各自的观点。按编撰者自己的说法，这是日本学界在日中关系研究领域“一次前所未有的尝试”，“世界上的两国关系史，很少能得到如此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果检视日本学界有关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成果，应该说此言不虚，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论述问题之深入，完全可以视为日本国内近40年中日关系研究的集大成者。参与本书写作的，除几位领衔者外，多为年轻学者，他们在所研究的领域多有所建树，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视为未来日本中日关系研究界的中坚力量。因此，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其具体的观点，作为学术研究和现实应用的参考，了解他们的看法和观点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下，中日关系正处于自恢复邦交以来前所未有的低谷，从严谨的学术立场，总结中日关系40年发展的历史，是必要的也是迫切的，学者有此义务和责任。出版者也有义务和责任，即将基于严肃学术立场、在学术层面上客观阐述自己观点的学者的研究成果及时出版，介绍给学界，以推动

研究的深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间交流四方面内容，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进行了综合性考察的专书，可以说充分反映了日本学者对40年中日关系的认知，相信对于我们全面观察中日关系、准确把握中日关系之关节点，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健康发展是极有价值和意义的。这就是我们翻译出版本书的基本考虑。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本着尊重学术、尊重作者的原则，尽量按原书将作者的叙述和观点完整、准确地翻译出来。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同意作者的观点，事实上，对于不少问题中日学者间是有不同看法的。对此，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我们采取加译者注的方式说明中方的习惯表述，并对文中所引的资料进行了一些补充说明。按照我们的出版要求，对一些章节中确需改动的表述，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做了修改；个别文章也有删除字词句甚或段落的，以删节号标示。遗憾的是，政治卷三宅康之先生所写的第八章和阿南友亮先生所写的第十五章，因对文章的修改未能与两位先生达成一致，最后只能忍痛割爱。

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支持。长期以来，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在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2008年由我国学者编撰的《中日友好交流30年（1978~2008）》一书就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出版的。对此我们表示敬意和衷心感谢。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日方的诸位学者，感谢诸位学者同意将研究成果交给我们出版，以及在书稿的翻译出版过程中所给与的协助。我们还要感谢东京大学出版会，因为有前期日文版出版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使我们能有一个较为规范的文本来进行中文本的翻译出版工作。

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非易事，远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具体到本书，参与写作的学者不下50人，论述的时间跨度也不止40年，许多问题多涉及恢复邦交之前；加之论述内容范围广，引用中日档案文献及其他材料极多。单是不同作者引述同一材料而表述不一致的问题，就让编辑花费大量时间加以核对，而引用的许多中方材料，则须逐一核对，更是费时费力。尽管译者、编者尽心尽力，差误似也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谅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6月

付梓之际

自古以来一直延续的日中关系从未像今天如此紧密。随着通信、交通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员和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化，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两国之间围绕政治和安全保障的紧张局面，反而在不断升级。在日中邦交正常化4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得不说，双方国民对对方抱有的好感度有所降低，双方依然存在许多没有消除的误解。

今后日中关系如何发展下去，不仅关系到两个国家，而且还会对地区和世界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东亚的日本和中国两个大国能够推动合作，彼此都将获得巨大的利益。另外，如果日中关系进步，那么东亚的国际秩序将会稳定，而该地区的繁荣会令全世界从中受益。然而，如果日中两国争斗不休，不仅双方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且由于两国之间的紧张和对抗，亚洲乃至全世界也会受到负面影响。这大概在任何人眼里都是明白无误的道理。

日本人与中国人能否让今后的日中关系得到发展？在我们思考如何构筑未来、展望将来之际，必须以史为鉴。是什么原因，又是什么样的人推动了日中关系的蓬勃发展？它走过了什么样的轨迹？在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正好40年的当下，分析和考察日中关系史的意义正在于此。

《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共三卷）是综合把握和详细探讨日中关系的前所未有的一次尝试。

第Ⅰ卷“政治卷”部分，列举了从日中邦交正常化一直到日本民主党政权诞生为止的40年中两国关系的16个重要主题，并按各个主题分析了包括两国国内情况和国际环境在内的各种因素。第Ⅱ卷“经济卷”，仍然是按主题考察了在任何人都始料未及的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中，日方是如何参与的，同时也加进了政府和企业相关人士的论述，对经济交流的成果和所存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第Ⅲ卷“社会·文化卷”，从“熊猫来日”一直到“池袋中华街”构想，列举了这40年中的一些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对日中相互印象的变化及其对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进行

考察。

本书各卷共同的基本主题是：日中之间不断扩大和深化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复杂化的利益与感情。考察日中关系的前提或者背景，既有社会制度、世界观，或者历史观、价值观的差异，也有各个时期全球和区域的不同状况。通过整个分析，也许我们可以理解日中关系所具有的坚韧性、脆弱性及其可能性。

世界上的两国关系史，很少能得到如此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编撰本书时，我们想起了200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北京出版的《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同年，步平编辑代表、高原明生监译的『中日關係史 1978～2008』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该书应该说是本书的姊妹篇，是一部由中方研究人员编撰的现代中日关系史，同时也是让读者了解“在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的范围内，中国的日本专家给大众提供了什么样的中日关系印象”（监译者序言）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原书也由政治卷、经济卷、文化教育与民间交流卷三册组成（翻译版本合为一册）。粗略比较来说，中国的研究著作资料比较详尽，而日本的研究著作则着重于分析，两者各有特色。在此，再次对给予日方启发的中国研究人员的努力表示感谢，并希望各位读者一定要对两本著作进行对照阅读，以便了解得更加全面。

我们的尝试是否成功，完全取决于读者的判断。在我们的编撰过程中，尽量注意进行学术的和中立的分析，但由于研究对象是距离现在比较近的历史，因此在事实的挖掘、推敲和探讨上，难免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给予坦率而有建设性的批评。

此外，我们希望像『中日關係史 1978～2008』那样忠实于原文的翻译版本在中国出版，以便能够让中国读者准确地了解日方的看法。另外，如果本书能够翻译成英文，听一听世界的意见，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的策划、研究和出版，与『中日關係史 1978～2008』一样，是日本笹川和平财团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资助项目。正是由于该基金的胡一平女士、玉腰辰己先生以及负责编辑的东京大学出版会的阿部俊一先生坚持不懈的努力，本书才得以出版。在此，谨代表编者和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者代表：高原明生

2012年8月

补 记

近年日中关系走入低谷。尽管双方各界人士都在竭诚竭力为改善两国关系寻找契机，但至今尚未出现良好的兆头。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作为对6年前出版的由中方学者联合撰写的《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的回应，由60多名日本学者共同执笔的《日中关系40年史（1972～2012）》4卷书的中文版今天能够出版，的确是一件令所有期待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人感到欣慰的事。值此书出版之际，衷心感谢为这项艰苦的工作付出巨大努力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及有关人士。

同时，鉴于中国国内的出版情况，中文版编者不得不将政治卷中的第八章和第十五章删除，并对其他篇、节的部分内容及表述形式进行了更改，这是令日方所有编者和执笔者感到十分遗憾的地方。我们衷心希望伴随着日中关系的逐渐改善及相关情况的变化，这部书最终能以再版的形式将删节的两章完整收录进来呈现给读者。

高原明生

2014年6月

社会·文化卷目录

序 章 日中相互认识的四十年

——文化事件中体现的相互印象的不定型化 // 001

// 园田茂人

I 冷战体制下的“日中友好”

第一章 熊猫来了！（1972）

——中国对日软实力史 // 015

// 家永真幸

第二章 什么是“太平学校”（1980）

——日中知识交流活动的迂回曲折 // 034

// 小熊旭 川岛真

第三章 是“进入”还是“侵略”（1982）

——日中历史认识问题的变迁与课题 // 053

// 川岛真

第四章 欢迎，中野良子！（1984）

——电影对相互形象演变的影响 // 083

// 玉腰辰己

第五章 对中舆论报道框架的重大转折

——以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为分水岭 // 109

// 高井洁司

II 以错综复杂的利益为视角

- 第六章 台湾“总统”选举带来的冲击（1996）
——给日中关系框架带来变化的台湾 // 139
// 清水丽
- 第七章 酒田短期大学关闭（2002）
——日中留学生交流秘史 // 163
// 牧野笃
- 第八章 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悲剧（2004）
——从体育比赛看日中关系史 // 189
// 吉冈桂子 斋藤德彦
- 第九章 席卷大连的罢工风潮（2005）
——日本商人看到的企业内部摩擦的演变 // 217
// 园田茂人
- 第十章 “池袋中国城”构想的“漫长等待”（2008）
——走向日本式的共生之路 // 239
// 陈来幸

序 章

日中相互认识的四十年

——文化事件中体现的相互印象的不定型化

园田茂人

前 言

在讲述日中关系时，必须提到的数据是内阁府进行的“关于外交的民意调查”。该调查从昭和50年（1975）开始几乎每年实施，从昭和53年（1978）开始，对“你对中国是否感到亲近”一问的回答分为（1）感到亲近、（2）相对而言感到亲近、（3）相对而言不感到亲近、（4）不感到亲近四项，受调查者从中择一回答。把（1）和（2）视为“感到亲近”、（3）和（4）视为“不感到亲近”，绘成图0-1，从中可见历年的变化。和后面提到的中国的同类调查不同，该调查针对相同的问题，以日本全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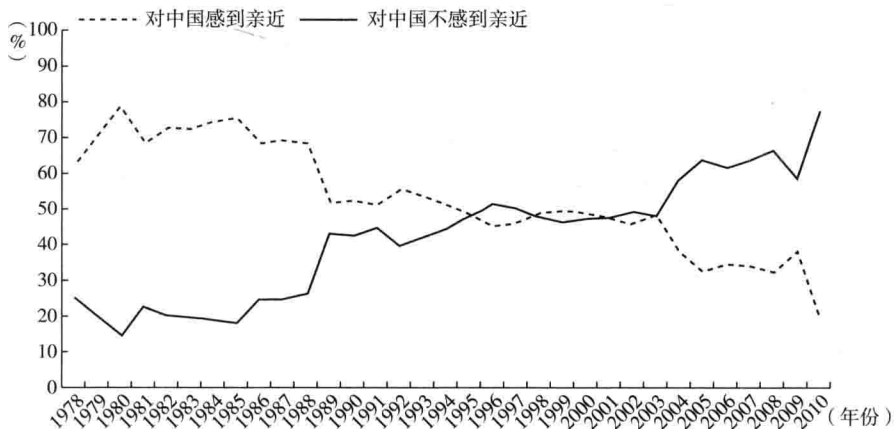


图 0-1 日本对华印象的变化 (1978~2010)

资料来源：内阁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

范围内的三千人为对象,以分层两阶段非人为抽出法进行了抽样调查,其特点是能够相当准确地描绘日本人对华印象的变化。

从昭和 47 年 (1972) 日中邦交正常化至今日,40 年间,如果以日本人的对华亲近感为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昭和 47 年 (1972) 至昭和 63 年 (1988)。由于缺少 1972 ~ 1977 年这 5 年期间的数据,结论不能过分地一般化,但是这段时期“感到亲近”的回答大致比“不感到亲近”的回答要高出将近 40 ~ 60 个百分点。特别是昭和 53 年 (1978) 至昭和 55 年 (1980) 间,“感到亲近”的回答比例直线上升,可见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极高。

第二,平成元年 (1989) 至平成 15 年 (2003)。这段时期,“感到亲近”的回答和“不感到亲近”的回答大约各占一半。“感到亲近”的回答虽然不像以往占绝大多数,但是“不感到亲近”的否定回答也并非绝大多数,每年都呈现出类似的结果。

第三,平成 16 年 (2004) 至今。与第一时期相反,“不感到亲近”的回答占了将近六成,比“感到亲近”的回答高出 20 个百分点,以平成 22 年 (2010) 为例,竟然高出近 58 个百分点。

如此看来,虽然各个时期内呈现比较稳定的回答模式,但是可以看出,最近 20 年,日本人对中国的亲近感逐渐下降,有时甚至急剧恶化。^①

而中国就对日本印象进行调查研究的开始于最近 10 年。由于尚不存在连续性的、较长时期的测量数据,而且抽样方法和表达方式等因调查时期和调查的设计主体而异,对变化的特点记述困难。精心收集和分析中国有关对日印象调查结果的小林良树指出,以 1990 年代中期为分水岭,中国对日本的印象开始恶化,这与韩国、台湾、东盟等亚洲其他地区不同,很可能是中国独特的模式 (小林, 2008: 93 ~ 94)。

2005 年后,在言论 NPO 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上,按时间顺序排列小林收集的数据,却无法形成像日本数据般整齐的模式 (参照图 0 - 2)。1999 年的《读卖新闻》调查和 2008 年的言论 NPO 的调查,虽然呈现肯定和否定两种相反的结果,然而,要想贯穿始末地解释“这一时期为何对日印象很好”却很困难。

然而,日中两国至少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后,

^① 这种变化,编者基于个人经验也容易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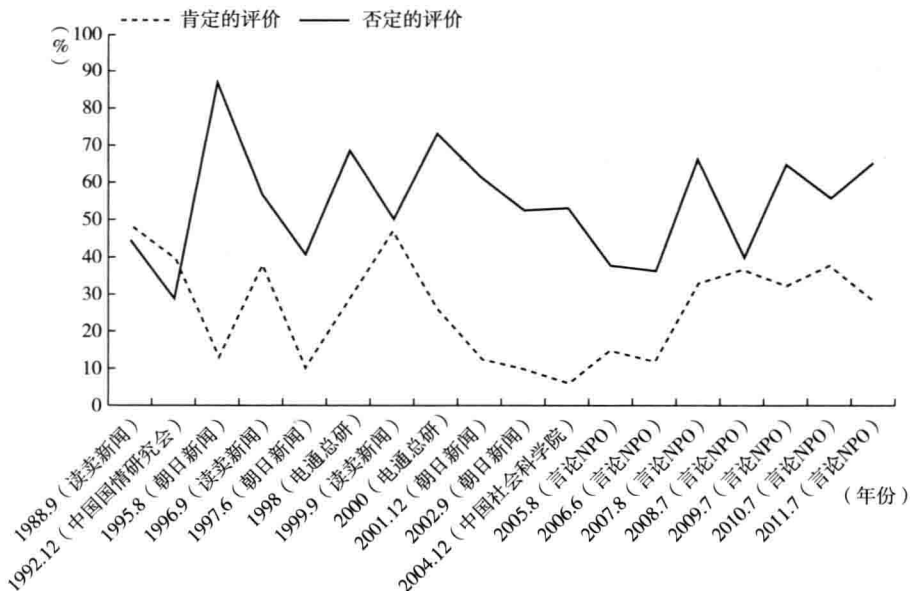


图 0-2 中国对日印象的变化 (1988 ~ 2011)

资料来源：(小林, 2008: 89), 并参考 <http://www.genron-npo.net/world/genre/cat119/2011.html>。

经济交流活跃, 人员往来频繁, 而日中两国的相互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 直至今日。

2011年9月15日, SMAP^① 前往中国举行首次海外演唱会, 中国原外交部部长唐家璇代读了温家宝总理的信, 而实际上, 这场演唱会是在温家宝总理的亲自邀请下实现的, 之后, 驻华大使馆的丹羽宇一郎大使也指出, “希望它能成为年轻人互相理解的起爆剂。如果 (SMAP) 能够在各省巡回演出就好了” (《朝日新闻》2011年9月16日)。从这能看出, 直到目前为止, 日中之间的相互印象都不理想, 至少两国的领导人都判断或是认定情况不佳。

一 日中相互印象的决定要素

那么, 为何日中两国的相互印象不佳呢?

① 日本最有名的流行团体。——译者注

日本对华印象的恶化，大多起因于不时发生特别是日中之间发生的具体事件。

例如，1989 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被认为是日本对华印象恶化的一大原因。2004～2005 年的反日游行、2010 年发生的尖阁诸岛^①撞船事件等，在报纸上聒噪一时的政治事件经常被解释为日本对华印象恶化的原因。

《日中关系：从战后走向新时代》的作者毛里和子指出，日本对华印象恶化的背景中存在政府之间关系的恶化，具体如下。

日本自从八九政治风波以来，对华印象逐渐恶化。对华印象的恶化，清晰显现在（1）八九政治风波、（2）1996 年台湾海峡的导弹演习、（3）2004～2005 年这三个时期中。2005 年 4 月反日游行后，对中国觉得亲近的人占 32.4%，认为对华关系良好的急剧下降到 19.7%。同时，“觉得亲近”和“认为良好”之间存在明显的差距。也就是说，与其说日本国民层面弥漫着对华反感的想法，不如说在政府层面存在问题（毛里，2006：194～196）（黑点为引者所加）。

上述的情况确实存在。然而，这种说法带有过度强调国际新闻所体现的政府关系影响对华印象形成的倾向。

日本的对华印象，也会因旅行、商业等伴随人员移动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从对方国家引进的物品和信息、日用品和（电影、动漫、文学及歌曲等）文化要素、食品和熊猫等受到影响。不仅如此，倘若日本方面眺望中国的环境发生变化，对华印象也将随之变化这一观点也无可厚非。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在理解对华印象的现状上，日本的“国际新闻偏向”似乎过大。

另一方面，日本在描述中国对日印象——大多定位为“反日”性质——的形成时，容易强调 1990 年代开始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互联网普及引起的“舆论”抬头、对轻易能从网络上获得的“日本”印象的接受和反抗、中国国内阶层差距的拉大以及对此的不满情绪等中国方面的体制因素及其变化。

清水美和在其著作《中国为何转向“反日”》中指出，中国政府的动向不仅是中国人的对日印象，也是日本人的对华印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内容如下。

从 90 年代后期开始，日中之间的历史认识差异日益严重，中国媒体呈现出清一色的反日论调。这一时期以邓小平为首的革命第二代退出历史舞

^① 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译者注

台，江泽民等第三代接过权力，局势不稳。因此，江泽民主政时期为了提高凝聚力，倡导爱国主义。为了强调抗日战争烈火中诞生的共产党政权的正当性，突出民众中潜在的“反日”这一“情感记忆”颇为见效。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来提升“反日”气氛，使日本方面认识到无论如何顾虑“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无法如愿以偿，而感到灰心，甚至滋生了反抗情绪，中国的“历史牌”反而失去了威力，于是产生了中国方面每次提到历史问题，日本的“厌华情绪”便扩大，批评中国的言论便得到支持，对华经济合作与投资受到影响这一构图（清水，2003：208~210）（黑点为引者所加）。

另外，曾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工作过的西本紫乃也在自己的著作《发言的中国人》中分析指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产生了一批自我主张的年轻人，其结果造成了“反日”言论的扩大。

中国一向着重于通过报纸和电视等现有媒体进行宣传报道。一旦对人为地说教是非黑白的信息习以为常，人们可能无法客观看待事物，习惯于从批评层面来思考问题。因此舆论在互联网上扩散的过程中，具有容易被危险偏向的过激意见淹没而失去个性的特点。至于出现粗暴无秩序的爱国行为，政府以往实施的媒体管制成为隐藏的要因这一点颇具讽刺意味（西本，2011：190）（黑点为引者所加）。

有不少人指出，日本的反华游行以及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接力”时爆发出来的反华情绪，刺激了中国人的感情，日本人的政治行为影响了中国的对日印象，而日本国内的论调中则很少留意这一点，而往往理解为是中国体制内的问题。

印象原本就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不容易掌握。本节开头虽然描述为“日中的相互印象不佳”，但这是在上述的调查中以对华的“亲近感”为据——在何种状态下觉得“亲近”则依赖回答者的主观判断，而关于“亲近”的客观含义也存在分歧——计算的一维结果，由此认为日本的对华印象整体恶化便属于过度普遍化的结论。

实际上，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小组，以在中国工作的日本派驻人员为对象，2001年与2010年实施了相同的问卷调查，得出的结论较为复杂。他们对中国人的印象，在有些问题上有所改善，在有些问题上没有变化，而在有些问题上则恶化了。

同样，就与日本人一起工作的中国员工对日本人的印象发生了哪些变

化,笔者等研究小组成员对日本企业在职的中国员工实施了问卷调查,其时序变化如图 0-3 所示。从 1991 年的首次调查到 2007 年的第二次调查,虽然日中之间交错着各种各样的国际新闻,对日本人“工作勤奋”“守规矩”的印象,至少在日本企业工作的中国员工中没有太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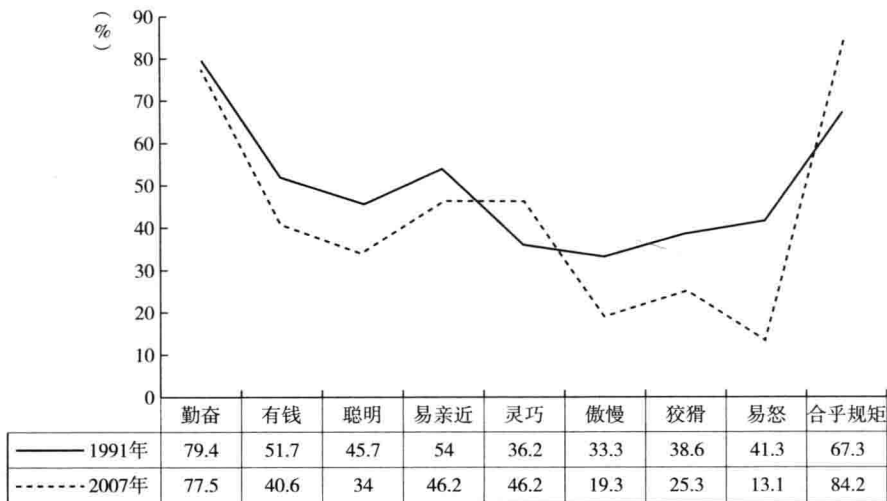


图 0-3 中国员工对日本人印象的变化 (1991 ~ 2007)

说明: 数值为回答“是”者的比例。

日本和中国实施的印象调查,以各种人群为对象,仔细查看会发现各自陈述了不同的意见,然而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只是单纯的计算结果。哪些理由,何种人群,向对方国家和国民们反映了什么印象?而它又经过了哪些过程发生变化或持续下来的?要回答这些单纯的问题,其实极其困难。

即使日中两国的政治关系紧张,也有可能对对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印象,反之亦然。我们以何种视角锁定何人,使用何种方法来把握日中两国间的相互印象,得到的结果也各不相同。

二 本卷的基本主题、构成及论点

1. 作为关键词的“文化事件”

本卷的使命在于,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把握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 40

年的日中关系。“社会、文化”就像报纸的“社会版”，一般理解为“既非政治也非经济的所有方面”。也许从 NPO/NGO 和市民的交流活动来看待日中关系，可以解释为代表了社会、文化的视角。^①但是，这些理解和解释，并不能充分利用“社会、文化的视角”所具有的丰富性和灵活性。

于是我们考虑，着眼于日中关系中的相互印象，按照时序追踪对之会产生影响或产生了影响的事件——本书将其定义为“文化事件”。按照时序挑出这些文化活动，尝试思考其中含有何种趋势，同时追踪与这些文化活动有关的日中关系史，即在各章尝试通过文化活动反映日中关系的 40 年历史，不是恰恰能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把握日中关系吗？

然而，挑选哪些文化事件却很伤脑筋。被认为对日中关系会造成影响或造成了影响的事件数量庞大，既有如今很多人都记忆犹新的事件，也有少数人才知道的事件。首先将 1972~2012 年大致十等分，这是出于准备与其数量相当的章节的考虑，且尽量多地列举出当时对日中关系造成影响的文化事件。因为特别重视日本人对华印象受到的影响，所以努力选了 50 岁以上的人们应该留有印象的文化事件。

观察这些挑选出的文化事件，为总结出日中关系变化的特征，与其他各卷的编者实行了“头脑风暴”，于此得出了“相互印象的不定型化”这一关键词，即根据当时的文化事件和交流的方式，各自持有的对他人的印象发生变形，因此对相互印象进行明确定型比较困难。

但是，挑选出的文化事件中特征相似的并不少。为了尽可能地 from 多种角度来把握日中的相互印象，为使文化事件均分散于各个时期，我们进行了调整。

同时，还特别留意寻找能够巧妙记述这些文化事件的撰述人才。无论文化事件多么深奥，如果没有能够收集相关资料并进行分析、准确加以表达的撰述人才，那么文化事件可能终结于呆板的记述，而不能把“社会、文化的视角”所具备的丰富性和灵活性传递给读者。

在考虑到对日中之间相互印象影响的程度、涉及主题的多样性、事件的时间分布以及具有充分写作能力的作者等诸多要素的同时，完成了本书

① 其实本套书出版的直接契机是中文版的《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日文版由高原明生监译，2009年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第三卷为文化教育、民间交流卷。而本卷与“文化教育”“民间交流”有很大区别，后者则追踪了青少年、媒体、友好城市和民间友好团体的交流。

的结构稿。时间是 2010 年 6 月。之后，由执笔候选人对执笔原稿进行汇报后进行的全天讨论，前后共安排了两次。

在各章展开“相互印象的不定型化”这一特点，并使各种论点产生共鸣——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执笔者们反复讨论，协调各自的观点。但是，由于从本书的结构稿完成直到出稿，仅有一年多的时间，而且不少执笔者都处在本职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所以编者基本坚持了对执笔者实力的信赖，对执笔者的挑选及进行个别交涉、统一书写等事件，则尽量留意不出现在前台。

我们向执笔者说明“这一卷的目标就像个人球技高超的巴西足球”，就是想传达一个信息，即如何处理各自负责的文化活动、从中引导出何种意义，希望各章担当人员发挥出实力。

2. 本书的构成及论点

依所述，本书的基本构思得以形成，因此，各章既可以作为独立的作品，也可以连续阅读来回顾日中关系的 40 年。

各章涉及的文化活动及论点介绍如下。

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的一段时间，国家和政府在日中相互印象的形成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为个人和团体直接前往对象国比较困难，直接交流受到较多的束缚，政府发出的信息对印象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恢复邦交后在日本对中国印象的问题上，熊猫无疑具有很大的意义。

第一章《熊猫来了!》，追踪了熊猫如何来到日本，事件又是如何发生变化的。《熊猫外交》一书的作者家永真幸认为，赠送作为日中友好象征的熊猫，是中国对日本开展的公共外交，而实际上这种手法早在两国恢复邦交前就存在。家永慎重地指出，“仅靠熊猫的事例无法完整论证中国的公共外交”，但是如果阅读本章，能够很好地理解在围绕熊猫的氛围下日中发展了何种关系，而日本滋生了哪种对华印象。

第二章《什么是“大平学校”》，反过来考证了日本政府对日本实施了哪些行动来塑造对日印象——其实也许日本人很少具有从事“对日印象工作”的意识。撰稿的小熊旭和川岛真回顾了 1980 年在北京成立的日语研修中心（通称“大平学校”）的历史轨迹，概观了日本方面是如何看待日中之间的知识交流活动的。小熊、川岛指出，极力推动该中心成立的大平首相的文化交流理念虽然之后被国际交流基金继承，然而在中国经济发展